

编者按:最近,上海文史界就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何时问题举行专门研讨,专家、学者们认为,该书应写作于作者担任太末令期间。为此,本报特约与会的钱汉东先生之文,以飨龙游广大读者。

钱汉东先生祖籍诸暨,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,系上海报业集团《新读写》杂志社名誉社长、编审,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,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,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,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,上海钱穆研究会名誉会长,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,上海交通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,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等。

钱汉东先生曾应邀为中华四大佛教名山题匾书联,为屈原故里、采石矶太白楼、东坡赤壁、陋室铭遗址、西施故里等500余处名胜古迹题匾书碑,还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题匾,被誉为当代文人书法家,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之出版《江山胜迹——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》等。他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,2013年荣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,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,2019年荣获诸暨市首届十大最美乡贤。

钱汉东先生于2002年春天开始寻访中华名窑,行程达10万千米,自费考察了宁夏、河南、西藏、新疆等22个省、市、自治区50处古窑遗址,写成专著《寻访中华名窑》。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散文形式撰写的古窑遗址田野考察报告。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、上海作家协会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举办作品研讨会,《寻访中华名窑》一书荣获2005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、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、2008年中国冰心散文奖。

钱汉东先生著有《岁月留香》《人间瓷话》《名人印象》《钱汉东考古文选》《钱汉东诗文集》《钱汉东散文随笔选》《寻梦西施故里》等书。

##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在龙游

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学术专著,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。这部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杰出、最系统、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,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日前,沪上召开了“《文心雕龙》在龙游”学术研讨会,其间多位学者认为,《文心雕龙》这部巨著可能是在南朝梁天监初(502年)刘勰任太末令(今龙游县)期间正式完稿的,距今已有1520年。

此时召开“《文心雕龙》在龙游”学术研讨会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。

著名文献学者杨明照《梁书刘勰传笺注》认为:“《文心雕龙》定稿应在齐末和帝中兴二年(同年四月梁武帝即位,为天监元年,即公元502年)。当时大文豪沈约仕齐,和帝时最为资盛。”学界泰斗饶宗颐在《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》中认为,《文心雕龙》定稿应在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后。他认为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到邹衍、冯衍、王衍时,均避讳使用梁武帝萧衍的“衍”字,由此可以推测《文心雕龙》最后定稿年代应在梁武帝时期,而此时刘勰在太末任职。

刘勰(约公元465年~?)字彦和,祖籍今山东省日照市。他少时家境清寒,父亲早逝,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回到娘家。刘勰的外公齐儒士是经学家,以教书为业。齐儒士见到外孙勤勉好学,决意送他去研习经学。刘勰十多岁时,母亲带着他到京口甘露寺聆听高僧法颖大师讲律学,期间有幸结识南朝名刹定林寺的僧祐大师。定林寺中藏有大量佛教典籍,齐、梁时的王公大臣纷纷到此听讲律令。僧祐见年幼的刘勰聪慧好学,甚是喜爱,让其协助整理佛教经典、编制目录、抄录佛经、撰写碑铭等。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记载:“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,积十余年,遂博通经论,因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,勰所定也。”刘勰在定林寺居住的十多年时间里,阅读了大量的佛学典

籍及儒家名著,开阔了知识视野,文学功底也日渐深厚,为日后创作《文心雕龙》积累了大量素材。刘勰19岁时,母亲不幸过世。服丧期满,恰逢朝廷下诏举人,刘勰便独自跑到当时最繁华的京城建康(今南京)定林寺寻找僧祐大师。

据说刘勰在定林寺前后完成《文心雕龙》初稿,但并“未为时流所称”。南朝看重门第,刘勰出身寒门,籍籍无名,纵有旷世惊人之作,也难以得到时人的肯定,这在当时自在情理之中。他请教僧祐大师如何是好,僧祐认真阅读了《文心雕龙》,还为此书做了校核与修订,为全书的文采及观点拍案叫绝。他点拨刘勰道:“何不去找沈约?”沈约是当朝丞相,与梁武帝交好,权倾朝野,也是南朝大学问家。于是,刘勰决意去找沈约,几经周折,终于呈送了此书。沈约仔细阅读《文心雕龙》文稿后,推崇备至,认为其“体大思精,深得文理”。

沈约赏识刘勰的才华,遂举荐刘勰进入仕途。据《梁书·文学传》载:“天监(公元502-519年)初,起家奉朝请,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。迁车骑仓曹参军。出为太末令,政有清绩。”或受高僧影响,刘勰一生无娶妻生子。既无妻室之累,也无父母之挂,刘勰轻车简从赴任了。刘勰任太末令后,践行了他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表达的“穷则独善以垂文,达则奉时以骋绩。若此文人,应梓材之士矣”的初心,知行合一,廉洁奉公不治私产,殚精竭虑一心为民,做出了一定的成绩。刘勰办案拒收贿赂,秉公办事,能一天办完的案子决不拖到第二天。刘勰治水成绩亦很突出,他时常带着随从出城巡视衢江,察看江水的涨落。这条河流是太末县农耕灌溉的命脉,但在山洪暴发之时,也会带来水患。对于各个险要地段,刘勰嘱咐衙役派专人守望修葺,以备不测。刘勰还采取多项措施,轻徭简政,劝农桑、薄赋税,使治下风化大行,人怀自厉,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。经吏部考核,刘勰被评为“政有清

绩”,此为政令简约而不扰民、不烦苛、不增加人民负担之义,也包含清廉自守之意。

刘勰离任后,太末百姓扶老携幼送行。太末城池不大,但刘勰足足走了两个多时辰才走出城去,可见他深受百姓的爱戴。就刘勰一生而言,他在太末的政绩与创作《文心雕龙》可并列为两大卓越成就,而二者是完全和谐统一的。

学界诸人对《文心雕龙》成书时间存在不同说法。著名学者陆侃如教授认为,《文心雕龙》应在天监六年定稿。牟世金教授(著有《刘勰年谱汇考》,巴蜀书社版)赞同饶宗颐之说,认为在天监六年七月之后,刘勰任太末令应满三年,至天监九年为止。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刘永翔认为从避讳等问题来看,《文心雕龙》成书年代与龙游是有关系的,虽然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,但从刘勰的行踪来分析,这是完全可能的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杨明是国内屈指可数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专家,他认为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表达之人生理想,“摛文必在纬军国,负重必在任栋梁”,在任太末令时得以部分实现。刘勰认为官史应当既积极从事政治、社会活动,又要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。杨教授也从避讳学上推断《文心雕龙》的修订成书年代与龙游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。据《龙游县志》记载:梁天监初年(公元502年),刘勰担任太末县令。刘勰根据沈约所提出的建议,在任期间完成对《文心雕龙》的重新修改和校订亦有可能。

刘勰的巨著《文心雕龙》引发了后人极大的研究兴趣,并由此产生了“文心学”。鲁迅认为《文心雕龙》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相媲美。刘勰一生中唯一的为官生涯在龙游,他的《文心雕龙》也因此与龙游有了关联,为龙游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在“《文心雕龙》在龙游”学术研讨会上,学者们呼吁在龙游建造“文心亭”或“雕龙阁”,以纪念刘勰这位为龙游发展为中国文学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。